

关于阳夏战役三个问题的辨析

陈九如 苏全有

阳夏战役(1911年10月中至11月底)是辛亥革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目前史学界对于该战役的研究虽有一些专论,但其中仍存在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故本文拟就阳夏战役中汉口大火、黎元洪对黄兴的态度、德国对华政策等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还有望于方家的指正。

(一) 汉口大火问题

关于汉口大火究竟是谁放的,史书的记载并不一致,其中有许多材料证明,清军对汉口大火负有责任。黎元洪主编的《武汉战纪》中说:“九月十一日敌军及地痞在汉口大肆焚烧,烟火连天,三日不灭。”^①西方人的记载也说明大火为清军所放,英文《汉口日报》报道:“如果本报所目睹的一切不足为凭,那么还有亲眼看见清军故意放火的几百人可以作证,如果冯国璋不知道市区的大火都是清军士兵得到他们直属上级军官的准许亲手造成的,那么他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了。”^②英国人苏古敦在《辛亥革命在汉口》中也说:11月1日,清军“密集的枪弹射向这个城市,一些地方开始着火。下午,清军又沿着一排排的房子点火,到了晚上,整个城市两边成了一片火海”^③。日本人内田顾一作有《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文中说:10月30日“初夜时,中国街上五处

发生火灾。火势最猛烈的要算歆生街的了,都是清军纵火的。”^④日本情报人员在写给本国的报告中对此作有说明:冯国璋声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烧”^⑤。冯国璋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也说:汉口“连日为炮火轰击,焚烧多处,料匪难于驻足。”^⑥无疑显露出大火为清军所放的端倪。以上所列各方面的记载,足以证明清军在汉口战役中是放了火的。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清军对汉口大火负有重大责任,但民军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也有放火情事。据清方记载,10月31日,“战移时,敌知不可守,焚所储药弹粮秣,延烧数里。”^⑦虽然这一材料作者立场倾向清方,但所记此事确为实事,因为民军在汉口失守前的的确确有焚烧库存事件发生,此事为张景良所为,且弹药点燃后“延烧数里”是可以理解的。《湖北文史资料》上载文说:10月28日,民军“因见敌兵伏于民房内,便即纵火焚房,敌便退至竞马场,我乃占据大智门”^⑧。《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记载道:张伟在汉口怡心茶楼放火,烧死楼内清兵数十人。^⑨《武汉战纪》中又说:10月29日,民军“攻歆生路之军队,死伤颇众,因敌以机关枪藏于歆生路两旁洋房内轰击,前进之兵成排倒毙,无法抵御。后于上风头纵火焚烧数栋,敌始退去”^⑩。至于民军在武昌起义、汉口外围战时,

〔收稿日期〕2001-5-15

〔作者简介〕陈九如(1963—),男,芜湖师专学报副教授,芜湖241008;苏全有(1966—),男,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新乡453002

也时有火攻事件发生。^①

由上可见,汉口大火主要是由清军引起的,但民军也应负一定责任,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产物。清军放火的目的,相对于民军来说比较复杂,其一主要是为了攻击。《武汉春秋》1983年第4期所载《三镇房地丛谈》一文及《辛亥武昌首义史》(第240页)等都认为,由于民军抵抗顽强,冯国璋见这块弹丸之地久攻不下,便下令火攻。《鄂州血史》(第126页)上记载:10月31日“冯国璋见民军英勇异常,而市街又处处设防,为其掩护,欲求进展,万分困难,即据状以电报向袁世凯请示。袁回电:‘速用火攻’。是日晚,敌遂在英租界背面及中国街市后方村落数处,举行纵火。”日本人也说:11月1日晚“火势仍极猛烈。盖因革命军坚守市区不退,官军迫不得已而实行火攻之故也”^②。其二,清军放火除了进攻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胡祖舜说:11月2日,“冯国璋亲往视察战区,我军散兵未及撤退者,枪声四起,冯军不敢深入,而肃清亦感困难,乃欲纵火焚之以报,荫昌、铁忠等复从而耸恿,汉口硚口以下,遂成一片焦土。”^③这一记载说明,清军放火有消灭民军残余力量的企图。其三,还有记载说,清军放火是为了阻止民军进攻。如甘绩熙曾回忆道:民军“队伍伏下开枪猛击,毙敌颇多。其余残败敌兵遂将该处民房放火烧着,烟焰遮蔽,因得逃去”^④。其四,清军放火还有阻止民军反攻的意图。张文鼎撰文说:“十一月一日上午四时三十分,我炮队营撤退至码头渡河,其余正陆续撤退。敌见我各方面均有炮击,疑我有主力军反攻,即在怡心茶楼、大夹街、小夹街、戏子街、萧家院、六渡桥一带放火,烟焰冲天,我军于此时得以安全退却。”^⑤李春萱也认为:“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法,不仅在于烧杀汉口的民军,且可阻止武昌的增援。”^⑥

(二) 黎元洪对黄兴的态度

《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页)上有文章说,阳夏战役期间,“黄兴上有黎元洪,黄的命令不能统一;下面的人事安排不能尽如黄意。战时情况,瞬息万变,黄黎往返磋商,

不能当机立断,最后使汉阳失守”。其他论著如《武昌起义史》、章士钊著《论黄留守》^⑦等多将黎元洪“掣肘”作为阳夏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其实事实绝非如此。

黎元洪在阳夏战役期间对黄兴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黎元洪派军队袭击清军后方,以配合黄兴正面作战。11月21日黎元洪在看完宾士礼、姚金镛对汉口的侦察报告后,即下令“拟陆海军共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领汉口谌家矶,然后向刘家庙满军施行攻击”。陆军由成炳荣指挥,海军由汤芑铭率领,凤凰山、青山大炮予以支援配合。黎元洪“发下命令后,又派参谋杨玺章、姚金镛、宾士礼帮同成炳荣计画,又派参谋徐达明、王文锦、吴兆鲤帮同海军计画”^⑧。此次攻击虽然未能断敌后路,但也起了配合汉阳正面战场的作用。其次,派人到前线督战。“迨九月初六我军失利,都督命令各机关知军事学者参与战线。”是晚,高元仕“即与各部同人渡江至大智门”^⑨。王成德是军事科书记长,“十月初五汉阳危急,全部人员奉都督命令组织奋勇队前往督战,当晚渡江至汉阳府署,半夜赴十里铺。”^⑩易自强“于九月初三日抵省,禀见都督,蒙派战时总司令部充军事参谋。”^⑪其他人如易正柏、杨振华^⑫、孙茂林、沈洪斌、孙洪斌、田采堂^⑬等许多军政府人员奔赴前线,也与黎元洪的号召不无关系。第三,阳夏战役期间的黎、黄关系十分和谐,黎元洪对黄兴比较友好。黄兴刚到武汉,黎元洪派人迎接,亲与交谈,并让人到处宣传,其对黄兴的到来是真心欢迎的,对此问题所有的记载大体一致。连当时在汉口的日本人也说:黎、黄“彼此间毫无反目之处,黎反因黄兴来汉以后,业已分担其一部繁重任务而感愉快”^⑭。黄兴到汉口后,黎元洪“特传谕前线服从黄之指挥如己亲临”^⑮,汉阳失守时,“克强先生要以身殉汉阳的消息,很快地传到武昌,黎元洪闻讯,赶紧派人到汉阳劝慰,挽请先生渡江休息,于是克强先生就在众人劝拥下于这天(十月初六日)午夜回到武昌都督府。”^⑯黄兴打算反攻汉口,黎元洪“当时是黄兴怎么说他就怎么说”^⑰。从上三点可知黎元洪对黄兴在阳夏战役中的态度如何。

有人评价说,“黄兴为司令后,黎元洪在人事配备、后勤供应等大致尚称便利,黄反攻汉口,黎力求配合,派队渡江扰敌后路。”^②黄兴“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形成了军事重心。汉阳的军事布置由黄主持,军队的调动指挥是统一的”^③。当时“陈磊斡旋于总司令部与都督府之间的联系”^④,吴兆麟也两边策应,因此,说黎元洪掣肘黄兴是没有根据的,阳夏战役期间的黎、黄关系比较稳定、和谐。黎、黄关系之所以和睦,是因为二人在对抗清军方面是一致的。此外,黄兴的谦和性格及让权思想也有一定影响。

(三) 德国对华政策倾向

武昌起义后,虽然列强有干涉的企图,但随着民军节节取胜,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武昌军政府方面采取了一些避免引起干涉的措施,同时列强也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故而于10月20日宣布中立。阳夏战役期间,列强的态度从总体上看是假中立,这毫无疑问,许多材料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立幌子下列强对民军的态度并不一致,英、美、法等国相对就比较中立,日本则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即既帮助清军,又不开罪于民军,德国则相对倾向于帮助清廷。

德国人倾向清廷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有一批德国人加入清军参与对民军作战。计约翰说:“清军军中有一名德国教官身着便服在大智门的炮手中进行工作。”^⑤内田顾一说:“曾在北洋军充当教练的德国军官,以观战武官的身分参入清军的作战计划等议事,他们目前正在江岸火车站。”其中“一名德国武官阵亡”^⑥。清军中之所以有许多德国人在活动,与任陆军部尚书的荫昌“偏爱德国的陆军制度”^⑦有关。其次,德军供给清军军需物质,这是德国对清军的最大帮助。10月26日清廷有奏文称,“飭由委员江苏候补知县欧阳萼,租赁德国小轮,购办烟煤接济萨镇冰兵舰。”^⑧萨镇冰也因“军舰上的煤炭业已用罄,向德国瑞记洋行秘密采购”^⑨。11月21日,欧阳萼致信袁世凯说:“幸遇旧识之德员延兴阿君,先借现银五万两,暂资开办。向相识之瑞记洋行

订购煤一千吨、米二万包、面粉四万包、马料柴草俱全,并租小轮四艘、拖驳四只,常川转运,遴派洋员,以充侦探。”11月14日,欧阳萼“奉冯军统谕,会同延兴阿商聘工程师,用洋松、油桶、机器、铁索建造行军桥梁。据工程师云:‘包定桥成后,军队四五千,枪炮器械,顷刻可达彼岸。’萼与姚工参领,日夜督工,赶紧修造,约二日内可以完竣。”欧阳萼后又“奉冯军统面谕觅购新式快枪及子弹等”,“兹已调查各洋行,惟德商礼和存有现货(系东三省总督所定),先付价银五成,可以取用……”^⑩此外,冯国璋部清军“为了保护后路的安全起见,从砦口经堤岸后湖至孝感建设一条大道,几日以来遍购油笼并从德国租界搬运木材作架桥筑堤之用”^⑪。日本情报人员在11月17日的报告中也证实了此事:“近三四日来,清军每日将客货车开入德租界内之铁道线上,入夜则向外运输物质。某夜曾见所运之物为长约一丈八尺、厚一寸半、宽一尺许之木材及木桶(水泥?)等物。”^⑫黄兴对德国人在阳夏战役中帮助清军十分清楚,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说:“惟此次虏军所以有此精良的军火,大半由某国暗中资助,吾同胞不可不永以为念也。”^⑬这里所说的“某国”即指德国。

德国人对清军的帮助,引起民军方面的极大不满。嘉鱼县“有一中国商人,为避免危险起见,曾于门口悬挂德国国旗,革命军及该地人民以德国为汉人之敌,立将该商人杀死,并将德旗撕毁。此虽小事,要足窥地方民心倾向之一斑。”^⑭而挂日本国旗却无此类事情发生。“武汉战役中,德国极力援助官军,因此九江一般人对德均极愤慨。据九江军政府官员谈称,九江军政府近接上海革命军政府外务部来信,大意谓:目下革命军中有企图以抵制德货、解雇德员等手段反对德国者,此乃甚不合时宜之举。革命军目下有隐忍避免惹起对外问题之必要;一俟大局已复,革命政府建立,则嗣后对彼采取报复手段之机会尽多,故此刻望暂时抑制感情,万勿轻举妄动致坏大事,希对此举加以取缔云。”^⑮黄兴在离汉赴沪的船上愤怒地对宫琦滔天说:“我们所以打败是因为德国人帮了清军的忙。德国人带来了新的大炮,并且亲自参加战斗,因此把我们打败了。我用

望远镜看了，所以我认得这些家伙。这些家伙现在这条船上。今天晚上，我想把这六个德国人丢在河里头，以为报仇。”当宫琦称在日本船上行动不便时，黄兴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丢那个买办好了。他是德国人的买办，

最可恶。”^④随后黄兴策划派商君杀了那个买办。

可见，德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显然倾向清军，并引起了民军方面的强烈反应，“清军方面已有德国人在声援，已是公开的秘密”^⑤。

①⑩黎元洪主编：《武汉战纪》，《辛亥革命史丛刊》（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140、138页。

②《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0页。

③《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42页。

④⑤⑥⑦⑧⑨内田顾一：《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174、176/182、169、181、179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55、555、558、572、567、599页。

⑥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6、78—79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3页。

⑧⑨《湖北文史资料》（四），第18、32页。

⑨⑩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593页。

⑪⑫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中），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7、307—309页。

⑬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⑭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戡兵之经过实录》，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⑮张文鼎：《汉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8页。

⑯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页。

⑰《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

⑱⑲⑲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512、511/432、439页。

⑲⑲皮明麻主编：《武昌起义史》第339、382/384/305/289页。

⑳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

㉑《黄兴传记资料》（1—5），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第223页。

㉒《辛亥革命回忆录》（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

㉓（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72号，第145页。

㉔（美）拉尔夫·乌·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㉕《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26页。

㉖《申报》，1911年12月2日。

㉗《黄兴传记资料》（八），第13页。